

ZHEJIANG MOSHI
ZHENGZHI JINGJIXUE SHIJIAO DE
GUANCHA YU SIKAO



浙江模式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陆立军 王祖强◎著



人民出版社

浙江模式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陆立军 王祖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 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模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陆立军、王祖强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01-006700-1

I. 浙… II. ①陆…②王…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浙江省
IV. D6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208 号

浙江模式

ZHEJIANG MOSHI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陆立军 王祖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700-1 定价:3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 论 浙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 1
一、浙江模式的含义与地方性特征	/ 2
二、浙江模式的普适性意义	/ 5
三、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	/ 8
四、浙江模式对创建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 13
第一章 浙江模式:形成与发展	/ 20
一、浙江模式研究成果述评	/ 21
二、浙江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 27
三、浙江模式的区域差异	/ 37
四、浙江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 54
第二章 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内源式发展的基石	/ 62
一、资本积累与财产权利:新的财产秩序	/ 62
二、所有制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多元化与共同发展	/ 69
三、新的个人所有制:个人成为投资主体和财产占有主体	/ 75
四、财产所有权的新形式:混合所有制	/ 80
第三章 民营经济成长: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	/ 88
一、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点	/ 88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总体状况与制度特征	/ 94
三、浙江民营经济的独特优势和面临的主要困难	/ 104
四、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 and 普适性意义	/ 108
五、促进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对策	/ 114
第四章 产业高端攀升: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 123
一、浙江特有的工业化路径:特点与成因	/ 123
二、浙江产业成长和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与趋势	/ 128

三、浙江工业发展的新方向:先进制造业	/ 140
四、地方产业集群:从本土化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 147
第五章 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易组织的成长	/ 159
一、农村工业化、市场化与专业市场的兴起	/ 159
二、专业市场的交易效率与集聚效应	/ 171
三、专业市场的网络化与新型业态	/ 175
四、专业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 184
第六章 民间资本扩张:从区际投资到跨国流动	/ 191
一、民间资本与民营金融	/ 191
二、新的金融秩序与新兴产业资本	/ 199
三、开放型经济Ⅰ:民间资本的省外扩张	/ 205
四、开放型经济Ⅱ:民间资本的境外扩张	/ 211
第七章 和谐合作:构筑新型劳资关系	/ 220
一、浙江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与特点	/ 220
二、浙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与员工权益的基本状况	/ 225
三、浙江私营企业劳资合作、冲突的主要表现与特征	/ 237
四、浙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调节与规范	/ 245
第八章 走向共同富裕:收入与财产分配的总趋势	/ 254
一、浙江收入分配制度的市场化	/ 254
二、浙江居民收入与消费的新格局	/ 267
三、浙江居民收入分配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 276
四、浙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思路	/ 284
结束语 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推进浙江模式新飞跃	/ 291
一、“两创”是在浙江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战略	/ 291
二、“两创”总战略是在浙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 293
三、实施“两创”总战略,促进浙江模式转型与提升	/ 295
后 记	/ 297

绪论

浙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内源式^② 发展,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创业活力,培育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区域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浙江发展模式也由此成为内源式发展的一个典范。^③ 总结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

①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② 内源式发展,或内生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内源发展观认为,发展应是由内部发生的,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就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应从本身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中汲取力量。许多学者对浙江省的内源式发展作过论述,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浙江的内源式发展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内源性,即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主体主要来自区域内部的传统积累或从干中学,包括区域的社会文化特质;二是经济主体的内源性,即构成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主要内生于浙江本土;三是分工网络的内源性,即本土企业在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在区域内部形成了以中小企业和专业市场为主体的发达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

③ 刘吉瑞(1997)提出了以“小企业、大市场”为典型特征的浙江模式概念,认为它是以家庭农场和小规模非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以商品市场和民间要素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具有完全竞争特性的初级市场经济模式;方民生(1997)提出:浙江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已形成了独特的“浙江市场化模式”,即“结构多元化的、贸易主导型的、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市场化模式”;金祥荣(2000)提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史晋川(2005)提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在包括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在内的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区域中民间和政府互动及选择的结果;罗卫东、许彬(2006)提出: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从形成机理、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上研究浙江模式,对于把握中国转轨经济的过程与特点,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中国体制转轨的成功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改革的成功是由于首先进行了分权改革,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传统计划体制缝隙中的市场经济因素,激活了存在于地区和民间的生产要素;分权改革形成了新的财产秩序和市场秩序,从而调动了地方和民间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和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

一、浙江模式的含义与地方性特征

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①,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浙江在市场先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经济、家族企业、产业集群、企业 and 市场“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网络、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劳资关系、社会保障体系、走共同富裕道路等方面形成的特色和优势,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个突发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经济社会变革。浙江市场化的特点是民间创业启动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在市场化启动时既缺少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没有较多的外资,而这些正是与许多内地省份相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模式既有显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浙江模式的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

1. 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形式看,主要体现为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小城镇建设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的形成和发展,这是浙江经济增长中可见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可见的形式只是浙江模式的表达方式;而内在的创业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质。在浙江精神中最根本的是自主发展的精神,个人自主是浙江文化的特色,这种精神是缔造企业家的文化土壤,浙江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浙江文化传统中具有这种“比

^① 参见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

较优势”^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是新的经济秩序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活力源源不断的根本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地走出来的,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浙江人靠着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闯出了一条促进经济繁荣的道路。因此,许多学者把浙江发展模式的形成看做是“无为而治”的产物。当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顺应群众的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促进产权制度改革,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等,则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扩展。具体地说,浙江这条自发式发展道路的形成,是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2. “民营、民办、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浙江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源自一种能创造出增长和财富的动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政策环境。实践证明,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增加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78~2006年,浙江GDP从124亿元增至15743亿元,增量的70%由民营经济创造;工业增加值从47亿元增加到5993亿元,增量的75%由民营经济创造。“十五”期末,浙江限额以上非国有投资达4429亿元,占同期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63.6%。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如集资修建飞机场、股份合资建设铁路和集资修造海塘等都是全国首创。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已经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在区域内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自我循环发展体系。面对我国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非常适合市场化运作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给浙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浙江的实践表明,着眼于个体私营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推进制度变迁,不仅市场化进展较快,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且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也较多。这就是说,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以市场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推进因素。与此同时,浙江的制度变迁模式也表

^① 参见严士凡、卢新波:《关于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前景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明,对于大国内的一个地区,采用渐进式制度变迁,可以在接近“帕累托改进”的社会福利状态下,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 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全国首家个体私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发源于浙江。早在2001年,浙江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就达到了97%,国有外经贸企业改制面达到了96%,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转换。众多的“全国第一”清楚地表明产权制度创新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能量,因为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除了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外,制度是一个更为根本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适合市场运作的产权制度的率先确立,使浙江优先分享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的巨大利益。

4. 从传统产业逐步发展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定位。“小产品,大市场”、“小企业,大产业”是浙江的特色。2006年,以机械建材、轻纺服装、医药化工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占到了浙江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利税的80%以上,出口的90%左右,就业的90%以上。嵊州的领带、诸暨的袜业、温州的打火机等传统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拥有数一数二的市场占有率。这些传统产业都是在家庭作坊、中小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设备、技术上它们并没有优势可言,但是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实施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它们构建了产业联合的规模优势和低成本优势,从而大胆走出家门,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销售自己的产品,使这种规模优势转换成了现实的竞争优势和丰厚的产业利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凡是外销比例较高的商品,都是地方产业支撑较强的行业;而且产品的本地化程度越高,国际竞争力也越强。在浙江经济国际化与本地化互动发展的过程中,联结两者的纽带则是市场网络的扩张效应。外商、外贸公司、出口生产企业、市场经营者和各类外贸经纪人等市场主体通力协作,通过连锁制、代理制、配送制等多种方式,构建国内外分市场和分支物流网络;凭借本土产业自主性扩张能力和生存能力强的优势,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结合起来,逐步由国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有效地弱化了浙江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国际化程度低”的矛盾。经济活动本地化与国际化的互动协调发展,又推动着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5. 服务型有为政府致力于形成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在浙江,

市场力量发挥了自组织的功能,政府则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浙江模式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商人(业主)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促成了浙江市场的兴起和产业的发展。实现政府管理方式、权力行使方式的转变,以形成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不管是积极引进外资还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政府积极作用的表现都是如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自由发展的环境条件,极力做好服务工作,而不在于政府掌管多少可以支配企业的权力。

在市场化进程中,浙江各级政府注重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规范自身行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少干预多引导,少限制多服务,少宣传多实干,着力转变企业的经营体制,完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营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区域发展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充分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更高效率的政府服务,而将很多管理职能下放给行业协会、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建立民间行业性自律组织来弥补“市场缺陷”。对修桥、铺路等城乡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间来投资和运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1)加强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供给、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的规划、建设与管理;(2)提高政府公共供给品如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质量检测等的适应度及效能;(3)实现中介性公共服务产品(如金融、广告、法律、审计、会计等)的多样化和系列化;(4)抓好区域公共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保护。这样,在浙江,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社会就比较容易对其施加压力,纠正其行为。

二、浙江模式的普适性意义

浙江模式具有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本土性、地方化、根植性;二是市场化、工业化的一般过程所具有的普适性。浙江模式的普适性价值在于其建立在新的财产秩序和市场秩序基础上的可扩展性,而不是由于其在市场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本土性、地方化、根植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发的扩展秩序。扩展秩序^①的含义主要

^① 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是:(1)这个秩序是自生、自发的秩序,非人为设计,但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融入了无数个体的分散知识。(2)这个秩序是可以不断扩展的。哈耶克之所以强调“扩展秩序”或者“自发秩序”,是由于他坚持了一种演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的逻辑。

浙江模式非常类似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模式,具有极为明显的内生性和原发性特征,在产权制度 and 市场制度的建立方面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质,不仅动力强劲,而且呈现出一种有机演化的秩序性。^① 确实,在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的关系方面,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在企业 and 雇员的关系方面,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浙江都在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关键并不是要不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而是如何在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处理好所有这些方面的关系。与江苏、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模式比较,浙江模式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因而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广东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得以大量引进外资,然而不可能指望内地多数省份都像广东那样,侧重以引进外资来推进市场化变迁。江苏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期农村集体工业的发展,然而从今天来看,这一因素已成为多数省份可求而不可得的经济变量,而且传统集体工业产权不明晰的困扰,有时更甚于国有企业。上海作为典型的大都市经济,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但其转换过程对于多数省份来说,很少具有典型意义。

在不同的市场化模式中,唯有浙江的市场化模式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意义。^② 就浙江模式自身而言,在早期阶段具有三个重要特点:(1)民间创业为主,不依赖国有投资和外资,群众广泛参与、普遍受益;(2)产业层次较低,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纺织品、日用工业品为主,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3)新兴产业区和市场的形成,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商业技巧、手工业的工艺技术、社会资本网络密切相关,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并发展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的许多企业创业伊始,通常都选择投资少、工艺技术简单、需求量大、以国内销售为主的产品。这些都是内地省份可以借鉴的做法。当然,浙江由于市场化起步较早,取得了先发优势,其他许多省份由于发展较迟,可能不一定会具有浙江那样好的市场条件,这是必须充分认识到的。因此,把浙江模式放到全球经济社会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

^① 参见罗卫东、许彬:《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参见卓勇良:《区域市场化途径比较及浙江模式的典型意义》,《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2期。

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为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区域现代化的颇有意义的案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其他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人认为浙江率先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普及全国,因此浙江在经济体制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如何看待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势?浙江体制的先发优势还存在不存在呢?我们认为,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势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以有形的经济形式存在,如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专业市场的形成,小城镇建设,区域特色产业的兴起,这些浙江都曾经在全国率先获得发展,现在在其他地方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相应地,浙江先发优势也就削弱了。另一种以社会关系和商业意识的形式存在,即人文环境和商业传统,个人自主意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体系等,它们根植于人的精神、观念和社会关系之中,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推动经济资本发挥更大的效率,构成了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源。这些社会关系和商业意识都是经过长期培育和积淀而形成的,其他地方难以很快模仿和建立。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①。党的十七大这些重要论断,对正确认识浙江模式在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普适性、长期性、艰巨性具有重要的启示。

浙江模式的前景在于率先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近30年来,浙江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率先培育了市场主体;以商品市场为基础,基本建立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也相对领先,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从企业组织制度还是从市场体系看,浙江经济都具有初级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市场主体为中小企业,无论在企业制度上还是组织形式上,都以家族制为核心,尚未完成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体制的结构、运行的机制等方面,还保留着较浓的计划体制色彩;市场经济所要

^①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2、17、18页。

求的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显而易见,如果一味满足于现有的改革成绩,甚至产生改革已经完成、再“无处可改”的想法,就将严重影响和制约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国际环境,加快推进体制创新和法制建设,努力建立起规范、公正、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推进浙江模式创新的制度保证。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要看广东,因为广东“先行一步”。但在今天,人们则可以从浙江的发展经验中看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并将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方针政策,从而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先发优势,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打造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等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系列关键问题的研究、实施上,形成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就已经包含在这些关系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浙江模式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意义。

三、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浙江模式的发展与完善,尤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内源性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的形式是内生型的;在不少领域,民族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这种满足内部资本、内生力量的发展模式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种模式要比外资依赖型模式、政府投资型模式更加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因此,浙江模式的内涵是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其可扩展性可概括为:

1. 资本积累与财产权利:新的财产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

^① 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浙江社会宏观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产权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新的财产秩序、亦即新的财产所有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为浙江人民艰难创业、大胆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因此,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在浙江竞相迸发,使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金融资产、市场物价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可供中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

随着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浙江居民具备了积累自身资产的权利和才能,城乡居民拥有的各种资产迅速增长。生产要素所有权格局的变化和财产所有权结构的改变,促成了社会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和多元化,个人成为资本投资主体和财产占有主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个人在未来公有制社会中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权利,个人财产权、自由迁徙权、职业选择权和民主管理权是其中应有之义。使劳动者成为社会投资主体和社会财产占有主体,可能是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①的重要途径。

浙江近30年发展的实践证明,财产权利与自主创业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两大法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浙江人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凭着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首开农村市场化、工业化的先河,成就了浙江模式的奇迹。历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大力推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改革的同时,毫不动摇地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明确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支持千百万群众大胆进行创业实践。在“全民创业”的过程中,浙江人民不但生活资料丰富了,储蓄存款、住房、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等或从无到有,或大幅度增加,而且拥有资本、股权甚至大中型企业,财产权利扩大了、部分收入资本化了;浙江人民冲破血缘、地域、户籍等传统体制与社会关系的束缚,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中西部地区,从国内到国外,到处投资办企业、办市场,或从事商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贸服务业,人身自由与自主创业的权利也扩大了、制度化了。

2. 专业市场的形成与成长: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扩展。改革开放以后,在浙江温州、绍兴、台州、义乌等地区,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流通渠道的不足,满足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专业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专业市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浙江,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大商贸流通产业。在新世纪,浙江有些大型专业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的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与此同时,也有些专业市场的地位和功能趋于萎缩,专业市场出现了分化、整合、转型与提升的趋势。因此,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考察、研究专业市场,使研究领域逐步从单纯研究市场转向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如产业集群、新兴商业资本、新型市场业态、现代物流、政府作用等,探索在市场先发地区率先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样式和路径。

3. 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与创新:新的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扩展。经过改革开放以后近30年的努力,浙江的经济展现出一幅从初级的传统市场经济向高级的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生动画卷,企业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从个体作坊、家庭工商户逐步向现代公司制企业发展的鲜明轨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走上了国内民间资本推动的内源式发展道路,民营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完成了从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成为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21世纪初,浙江民营企业背靠大国经济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经营的路子,打响“浙商”品牌,逐步实现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与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4. 市场和投资从国内向国际扩张:新兴产业资本的形成与扩展。浙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在形成路径、产权主体、产业组织形态、市场网络、产业层次、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质。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成长与民营企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浙江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新兴产业资本的扩展主要表现在:(1)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基本形成。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浙江民营企业个数基本不变,其间不断有新企业诞生和老企业被淘汰,企业总量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生产网络。(2)交易方式不断创新,市场范围由国

内走向国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生产企业规模扩大,一些企业集团将品牌资源和一定的资产,与供销大军的优势互相嫁接,组建遍布全国的独享式销售网络,使销售和生产实现了科斯(Coase)意义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且,营销手段日益先进,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日益增多,大大改善了市场营销的机制和能力。(3)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发展,在主动参与国内区域统筹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投资领域由国内走向国际。浙江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丰富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是浙江实施“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①,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正在成为浙江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亮点。(4)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浙江民营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单个企业或某个生产环节,而在于民营企业之间形成的分工网络结构,在于那条完整的、很难复制的产业链。从产业提升的角度看,经过近30年的技术、管理、营销、品牌的积累,浙江民营企业在传统产业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例如服装业,许多中国人穿的世界名牌,大多数都是浙江民营企业生产的;宁波、温州、绍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除了品牌、设计等以外,从规模、质量到技术,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并不逊色。

5. 产业的扩张与高端攀升:新兴产业区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专业市场、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为显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浙江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到机械、电子、汽摩配等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显著轨迹;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产业集群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之中,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尤其是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增加,浙江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突破口,开始走上主要由信息化推动、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浙江企业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尤其是以融入长三角和“走出去”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为契机,发挥内源式发展的比较优势,促进地方产业的扩张与升级,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曾经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浙江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低层次、低技术水平上,成为制约经济整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瓶颈。应当说,这种看法是不全

^① 习近平:《正确处理事关“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几个重要关系》,《政策瞭望》2005年第12期。

面的。事实上,浙江的纺织业、普通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等五个传统优势产业部门,在38个主要制造业中一直居于全国前10位。不仅如此,浙江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用现代服务业提升浙江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浙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21世纪初,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进一步加快,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日益成为吸纳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为浙江制造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6. 构筑新型和谐劳资关系:新的劳动关系的形成与扩展。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较长,私营企业的规模较大,劳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劳资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同时,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和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规章,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和经验。就浙江而言,发达的个体私营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使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被弱化。从市场的发育来看,经过努力培育和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初步发挥了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转型期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自愿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合作与共同利益是主流,冲突与利益对立是支流;雇佣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到私营企业主的欢迎,而且受到外来务工者、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等劳方的广泛认同。目前,在浙江,劳资关系在总体上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劳资双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在私营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劳资争议和劳资冲突,其性质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的非对抗性关系。虽然近年来浙江私营企业的劳资争议和劳资冲突有增多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契约、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但在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合作、互利是劳资关系的主流,在合作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是劳资双方的共同选择。

7. 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新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次变革之后,浙江初步形成了以市场化和效率优先为主要特征的有自身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在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浙江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逐步实现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的全社会共同富裕构想,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正走在通向共同富裕、和谐发展道路上。尤其是按生产要素所做贡献分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2007年6月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根据浙江发展实际,提出